戲劇研究　第29期
Journal of Theater Studies
2022年1月　頁137-164
DOI: 10.6257/JOTS.202201_(29).137

莫拉佳之《英雄和聖人》中的失能賽博格*

施純宜
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副教授

我知道賽博格神話的眞相，知道非失能者如何嘗試將失能呈現爲一種非凡優勢，因爲我就是賽博格。
~史伯茲〈理論中的失能〉

前言：莫拉佳及《英雄和聖人》

哈樂薇（Donna Haraway）在其影響深遠的〈賽博格宣言〉（"A Cyborg Manifesto"）中，闡述賽博格理論來自於兩大影響：有色女性（women of color）的身份建構及女性主義作家的科幻作品。有色女性呈現的是一種賽博格身份：結合外來身份而成爲具有潛能的主體。讀寫能力是有色女性的特點之一；美國有色女性的詩作和故事向來和書寫有關，和通向指涉的力量有關。語言政治瀰漫於有色女性的奮鬥中，而有關語言的故事在當代美國有色女性的豐富書寫中具有特殊力量。哈樂薇以墨西哥裔美國籍的莫拉佳（Cherríe Moraga, 1952-）爲例，在一九八三年的詩集《愛在不平靜的年代》（*Loving in the War Years*）中，她探索墨裔美籍女性的身份建構和認同。莫拉佳的絕佳語言「並非單一、完整，而是明顯的混合，是英文和西班牙文堆疊而成的怪物，兩者皆是征服者的語言。但是這個怪物，不受征服前的原始語言的限制，雕琢出有色女性的情慾、幹練和強而有

* 本文爲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當代英美劇場中的失能演繹（III）」（MOST 107-2410-H-002-209）的研究成果。作者誠摯感謝審查人對論文的評論和建議，同時謝謝期刊執行編輯孟芳的溫暖鼓勵和盡心協助。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力的身份」。[1]莫拉佳的語言暗顯外來女性的生存之道，不是她們的單純，而是生活在界線之間，打破原始、單一、完整及永恆之神話的力量。書寫成爲莫拉佳身爲有色女性的標記。簡而言之，莫拉佳的語言彰顯哈樂薇所推崇的「賽博格書寫」（cyborg writing）的特色：混雜、矛盾、曖昧且具有轉化和改變可能的書寫。

莫拉佳崛起於一九八〇年代，著作橫跨多項領域，包括散文、詩歌、小說和戲劇，也是積極的女性主義、女同性戀運動者。身爲墨裔美籍女性，她的書寫風格被哈樂薇喻爲「賽博格書寫」，成爲激發其賽博格理論的來源之一。有趣的是，她的第三部劇作，《英雄和聖人》（*Heroes and Saints*），以頭部和座車結合而成的薛麗姬塔／薛麗（Cerezita/Cere）爲主角，在形體上展現哈樂薇所稱讚的人類和機械混合而成的賽博格身體。《英雄和聖人》於一九九二年在美國舊金山首演，由塔卡查克卡斯（Albert Takazauckas）執導。在「作者註記」中，莫拉佳強調雖然該劇是虛構的故事，但卻是對眞實事件的回應：一九八八年由查瑞茲（Cesar Chárez）與其所領導的工會，因葡萄園遭受化學藥劑汙染的問題進行抗議和抵制；查瑞茲的三十六天禁食抗議結束不到一個月，工會副主席胡兒塔（Dolores Huerta）在舉辦一場抗議布希總統漠視問題的記者會時，遭受警方暴力。莫拉佳同時也說明塑造薛麗的構想來自兩方面，一方面是觀看工會的紀錄片《憤怒的葡萄》（*The Wrath of Grapes*, 1986），報導在加州聖喬昆谷（San Joaquin Valley）的麥克法蘭市（McFarland），許多孩童診斷患有癌症或出生時即有缺陷；其中一位孩童特別引起她的注意，他的母親於懷孕時期在噴灑殺蟲劑的田園工作，導致他出生時沒有雙臂和雙腿。另一方面則是受到墨裔美籍劇作家佛戴斯（Luis Valdez）之《龐丘莊園的皺縮頭顱》（*The Shrunken Head of Pancho Villa*, 1964）的影響，劇中男主角貝拉米諾（Belarmino），只有頭部，沒有身軀。[2]《英雄和聖人》因此可說是莫拉佳的憤怒控訴，希望爲果園工人尋求公義和支持，劇作最重要的主題即是工人及其家庭因毒害問題所受到的迫害和影響。

---

[1] Donna Haraway, “A Cyborg Manifesto: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Feminism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in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pp. 175-176. 之後論文引用本書時，不再另加註腳，直接於正文中標註頁碼。

[2] Cherríe Moraga, *Heroes and Saints & Other Plays* (Albuquerque: West End Press, 1994), p. 89. 之後論文引用本書時，不再另加註腳，直接於正文中標註頁碼。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劇中故事發生於一九八八年的加州聖喬昆谷的麥克羅佛林鎮（McLaughlin），一個虛構的地方，當地的墨裔工人社區正遭受嚴重的環境汙染問題：在葡萄園工作的婦女因接觸到噴灑的化學藥劑，或是飲用含有毒害物質的自來水，出生的嬰兒或孩童因吸入母親的乳汁，或是死於癌症、或是身體變形。病孩的屍體陸續被發現掛在十字架上，立於葡萄園中。連續的事件及薛麗——最早的受害者之一，引起媒體的關注。

一如莫拉佳之劇作向有的特色，《英雄和聖人》質疑、顛覆性別、種族、文化、宗教和階級的壓迫。然而，該劇極爲重要的一點，即目前研究莫拉佳之著作的唯一專書作者雅布羅—本札拉諾（Yvonne Yarbro-Bejarano）所指出的，在西方歷史中，如薛麗般身體失能或異常的人一直被隱藏在私密家中，直到最近，歸功於失能者平權運動，失能者在公衆領域的能見度和參與得以不斷增加。呈現失能薛麗成爲社區奮鬥中的主要人物，「《英雄和聖人》在西方劇場中開建新舞台，彌補過去缺乏對這族群的滿意呈現」。[3]換而言之，以失能薛麗爲主角，呼應在西方歷史中失能者身份和地位的正向改變，增添《英雄和聖人》的意涵和重要性。有鑑於此，本論文將以失能研究爲範疇，剖析劇中薛麗之賽博格身體的演繹與相關議題。

目前已發表的相關研究著作有兩篇，一篇是戴維斯（Telory W. Davies）於二〇〇六年發表的期刊論文，〈種族、性別和失能：雪莉．莫拉佳的無身頭部〉（“Race, Gender, and Disability: Cherríe Moraga’s Bodiless Head”）。戴維斯認爲莫拉佳僅是運用失能來作爲種族、性別及經濟遭受壓迫的隱喻。他以二〇〇一年於加州聖荷西市演出、馬帝尼茲（Alma Martinez）執導的版本爲例。在舞台上，薛麗的座車的設計未能實際且貼切符合她的行駛和動線，以及演出薛麗的女演員爲非失能者，謝幕時，全身出現，打破之前所呈演的薛麗，致使薛麗的失能僅止於舞台。換句話說，莫拉佳在劇本中的舞台指示雖然明確、具體，然而搬上舞台時卻產生未能想見的困難和挑戰，這些困難和挑戰影響了失能薛麗的呈現和眞實性。戴維斯進而呼籲由失能演員演出失能角色，「失能演員踏進主流劇場的第一步即是能被看見」。[4]另一篇研究著作則是蜜妮契（Julie Avril

[3] Yvonne Yarbro-Bejarano, *The Wounded Heart: Writing on Cherríe Moraga*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01), p. 72.

[4] Telory W. Davies, “Race, Gender, and Disability: Cherríe Moraga’s Bodiless Head,” *Journal of Dramatic Theory and Criticism* 21.1 (Fall 2006): 4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Minich）的二〇一一年專章論文，〈盡你所能造就阿茲特蘭族：雪莉．莫拉佳之《英雄和聖人》中的失能〉（"You Gotta Make Aztlán Any Way You Can: Disability in Cherríe Moraga's *Heroes and Saints*"）。該論文提出兩大論點，其一是墨西哥及墨裔美籍母親形象的改變：朵莉絲（Dolores）代表傳統、受苦的母親；艾帕蘿（Amparo）無法生育，領養小孩，並且協助社區中的小孩；佑蘭達（Yolanda）因女兒病死而加入群眾抗爭之列，是新一代的母親；最重要的是，薛麗於劇末扮裝成聖母，代表墨西哥及墨裔美籍人民的宗教／精神母親。第二論點則有關薛麗的失能，蜜妮契認爲莫拉佳理想中的阿茲特蘭族是由多樣身體所組成，而薛麗的失能身體正是其中一種。薛麗的失能身體象徵墨裔美籍的政治自主和國族主義的場域，她最後的抗爭，體現國族主義的政治行動。然而薛麗的死亡，剝奪了她的自主性，斷除了先前在她身上所開展的多種可能性，終究被視爲政治運動的受害者。因此，《英雄和聖人》顯示當國家、世界仍然建構在對失能、種族、情慾和性別的壓迫之上，解放和自由之願景的實現毫無可能。[5]

戴維斯就舞台演繹問題，對《英雄和聖人》提出失能薛麗僅爲隱喻的批判，強調當前失能劇作家、演員和劇場工作者的相同關切、共同希望，即是由失能演員演出失能角色。[6]蜜妮契則以主題研究爲主，探索失能和種族、國族主義之間的關係和意義，闡釋莫拉佳寫作和創作中一項重要的理念和議題，然而不難看出論文將薛麗的失能視作一個種族、國族的隱喻。雖然兩位學者分析的角度不同，卻有類似的結論：《英雄和聖人》中薛麗的失能是爲隱喻。在《左手協奏曲：失能及陌異的身體》（*Concerto for the Left Hand: Disability and the Defamiliar Body*）中，戴維森（Michael Davidson）提出他的觀察：目前失能研究學者有個共同的論點，即是面對將失能用作隱喻、鮮少正視眞實失能人士的實際生活狀況，且一旦隱喻目的達成後，失能者便退場或消失，失能研究學者和失能創作者、運動者皆共同致力於翻轉這種模式，拒絕失能僅具隱喻的功能和意義。[7]戴

[5] Julie Avril Minich, "You Gotta Make Aztlán Any Way You Can: Disability in Cherríe Moraga's *Heroes and Saints*," in *Disability and Mothering: Liminal Spaces of Embodied Knowledge*, ed. Cynthia Lewiecki-Wilson and Jen Cellio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274.

[6] 對於失能創作者和工作者拒絕視失能爲隱喻及期盼由失能演員演出失能角色，請見由托蘭（Kathleen Tolan）所整理並發表的會談紀錄：〈我們不是隱喻〉（"We Are Not a Metaphor," *American Theatre* (April 2001): 17-21, 57-59）。

[7] Michael Davidson, *Concerto for the Left Hand: Disability and the Defamiliar Body* (Ann Arbor: Michigan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維斯和蜜妮契或許屬於戴維森所說的學者。作者肯定兩位學者對失能研究的貢獻，但也希望提出不同論點：視《英雄和聖人》中的失能薛麗爲隱喻的看法狹隘，忽略了莫拉佳對薛麗之失能經驗的寫實描繪，而這寫實的呈現深刻地反映失能者在現實生活中的狀況和處境。因此，本論文的出發點在於更縝密地研究《英雄和聖人》，闡述上述兩篇論文中未深切探討的薛麗的失能經驗，論辯薛麗一角的形塑並非僅止於隱喻。再者，在當前英美劇場中有關失能賽博格的劇本甚爲少見之際，作者亦希望透過本論文對《英雄和聖人》的探討，思索賽博格身體及相關議題，尤其當科技日新月異，失能者與科技或機械之間的關係更值得關切、更需探討。[8]本文將闡釋哈樂薇的賽博格理論中有關失能、失能者的部份。哈樂薇於一九八五年發表〈賽博格宣言：八〇年代的科學、科技與社會女性主義〉（“A Cyborg Manifesto: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 Feminism in the 1980s”），之後修改爲〈賽博格宣言：二十世紀末的的科學、科技與社會女性主義〉（“A Cyborg Manifesto: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Feminism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於一九九一年發表。在一九九一年的版本中，哈樂薇納入失能者，做爲賽博格的典範之一，引發失能研究學者的諸多評論。[9]本論文將整合哈樂薇及失能研究學者對賽博格的論述，定義爲「失能賽博格政治」（disability cyborg politics），以此爲理論架構來分析《英雄和聖人》中的賽博格議題。結合理論和劇本的探討，作者同時希冀本論文能爲當代英美劇場中的失能賽博格研究提供周延、深入且有助益的論述模式。

一、失能賽博格政治

在〈賽博格宣言〉中，哈樂薇指出在二十世紀末的美國科學文化中，三種重要的界線已被打破：人類和動物、生物和機械、物質和非物質。在生物和機械方面，機械、科技的發展和進步致使過去生物與機械之間明顯的差異或分界變得全

[8] 目前英美劇場中不僅有關失能賽博格的劇作非常稀少，研究著作亦不多見，已出版的只見派克—史塔巴克（Jennifer Parker-Starbuck）所著的《賽博格劇場：多媒體演繹中的肉體／科技交集》（*Cyborg Theatre: Corporeal/Technological Intersections in Multimedia Performance*,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1）。該書主要分析在二十世紀末到二十一世紀初的多媒體劇場中，表演者，包括失能表演者，如何運用影音技術和數位科技來展現表演者身體和科技結合爲一的過程，成就混雜、蛻變的主體。

[9] 本論文以1991年版本爲主，書目請見註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然模糊；當人類和機械的界線失去時，賽博格於焉產生。賽博格是一種機械／科技的生物體制（cybernetic organism），混合了機械和生物，既是眞實、也是虛構，是生活經驗和想像結合的產物。哈樂薇說：「賽博格是幻想和物質現實的濃縮意象，兩者融合一體，產生歷史性的轉變機會」（頁150）。在二十世紀末前，我們都將成爲人類和機械的混雜體——我們都是賽博格。賽博格模糊、僭越了生物／機械的界線，顚覆了生物的整體性、一致性，開創嶄新的主體。哈樂薇認爲半身麻痺患者及重度失能者具有最深切的體驗，因爲他們對機械的使用和依賴，如工具、裝置、義肢等，促使他們和機械有所連結。這樣的連結，對哈樂薇而言，非但不是侵犯或妨害，而是實際且有助益的結合；當這樣的結合愈發緊密時，極可能成爲愉悅的來源之一。哈樂薇另以科幻小說作家麥考菲莉（Anne McCaffrey）的《唱歌的太空船》（*The Ship Who Sang*, 1969）爲例。作品中的女主角哈爾法（Helva），因出生時極度失能而被改造成一艘太空船。哈樂薇在人類頭腦和複雜機械結合的哈爾法身上，看到性別、情慾、形體和技能獲得重新建構，質問「我們的身體爲何需止於肌膚」（頁178）？哈樂薇揭櫫一種生物和機械全然整合的個體，機械的系統及與其整合並非問題。她強調迫切之事，不是擁有失去之肉體的權利，而是瞭解身爲生物之他者的科技是可以納含、擁抱，建立賽博格意識。哈樂薇所描述的生物與科技的關係，是一種親密、和諧關係。她的賽博格理論駁逆了當時女性主義者對於新科技的不信任，她們認爲科技可能危害女性的身體完整性和社會地位；哈樂薇抱持截然不同的態度和看法，力促女性主義者和進步人士嘗試讓賽博格成爲其具體的主體形象。[10]換而言之，哈樂薇反對視科技爲對父權社會有利的壓迫、操控力量；女性主義者不應懼怕或敵視科技，而應視它爲可能解放女性的助力。賽博格的主體形塑和建構打破人類和機械的界線，打破被簡化爲「天生自然」的歸類、身份或階級，它是女性主義者身份及連結一起的新方式、新力量，開創新的方向和未來。[11]

[10] Baukje Prins, "The Ethics of Hybrid Subjects: Feminist Constructivism According to Donna Haraway," S*cience, Technology, & Human Values* 20.3 (Summer 1995): 359-360.

[11] 哈樂薇在後續有關賽博格的訪談和著作中，未再論及失能。請見"Cyborgs at Large: Interview with Donna Haraway," in *Technoculture*, ed. Constance Penley and Andrew Ros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1); "The Actors Are Cyborg, Nature Is Coyote, and the Geography Is Elsewhere: Postscript to 'Cyborgs at Large'," in *Technoculture*, ed. Constance Penley and Andrew Ros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1); "Cyborgs and Symbionts: Living Together in the New World Order," in *The Cyborg Handbook*,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相較於其他在一九九〇年代探討賽博格的女性主義者，[12]哈樂薇在〈賽博格宣言〉中罕見地觸及失能者，因此受到失能研究學者的關注和回應。早期學者所提出的評論傾向於質疑和批判。主要原因之一，在於失能研究中，科技向來主要用於修復、治癒及恢復正常。[13]最適切的例子之一，即是以演電影《超人》（*Superman*）而聞名的美國演員李維（Christopher Reeve）。他在一九九五年的一次馬術比賽時發生意外，脊椎嚴重受傷，致使全身癱瘓，必須使用輪椅和呼吸器。李維努力克服自身障礙，並且成立基金會，投身社會公益事業，致力於推動幹細胞研究，經常舉辦巡迴演講。在葛雷（Chris Hables Gray）的專書《賽博格公民：後人類時代的政治》（*Cyborg Citizens: Politics in the Posthuman Age*）的介紹章節，第一部份以「超人的傷跛」（"The Crippling of Superman"）爲題，一開始即以李維來說明賽博格。葛雷認爲李維的故事雖然讓人難過，但卻是一個「賽博格英雄故事」，[14]因爲李維未因爲自身狀況而悲嘆命運，卻是成爲賽博格的強力倡導者。葛雷顯然認爲失能者藉用科技、高科技來彌補身體缺陷及克服障礙是賽博格的最佳典範。在探討機械／輔具和身體失能的論述中，如葛雷的觀點，常常侷限於科技如何幫助身障者恢復或行使功能，進而回歸正常。但對失能研究學者來說，科技固然能夠治療、協助或增進身障者，但是因爲強調科技能夠再造正常功能、正常身體，賽博格同時也強化了正常／不正常的意識型態。再

ed. Chris Hables Gray, Steven Mentor, and Heidi J. Figueroa-Sarriera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Cyborgs to Companion Species: Reconfiguring Kinship in Technoscience," in *The Haraway Reader*, ed. Donna Haraway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Cyborgs, Coyotes, and Dogs: A Kinship of Feminist Figurations," in *The Haraway Reader*, ed. Donna Haraway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12 請見Chela Sandoval's "New Science: Cyborg Feminism and the Methodology of the Oppressed," in *Cybersexualities: A Reader on Feminist Theory, Cyborgs, and Cyberspace*, ed. Jenny Wolmark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9); N. Katherine Hayles' "The Life Cycle of Cyborgs: Writing the Posthuman," in *The Cyborg Handbook*, ed. Chris Hables Gray, Steven Mentor, and Heidi J. Figueroa-Sarriera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Jennifer González's "Envisioning Cyborg Bodies," in *The Cyborg Handbook*, ed. Chris Hables Gray, Steven Mentor, and Heidi J. Figueroa-Sarriera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Ann Balsamo's *Technologies of the Gendered Body: Reading Cyborg Women*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6)。

13 Dan Goodley, *Disability Studies: An Interdisciplinary Introduction* (Los Angeles: SAGE, 2010), p. 167.

14 Chris Hables Gray, *Cyborg Citizens: Politics in the Posthuman Age*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p. 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者，因爲依賴機械或科技，身障者可以恢復正常而成爲賽博格，甚或超越正常而成爲「超級人類」（superhuman）、「超級傷跛」（supercrip），如皮斯托利斯（Oscar Pistorius）[15]，但可能仍被視爲「半個人類」（half a human being）。換句話說，從過去的「次等人類」（subhuman）到目前的賽博格，身障者仍可能承受向有的汙名。

另一項重要原因，則是多位失能研究學者所提出的批判：哈樂薇所想像的賽博格欠缺失能身體和科技共存的實際生活經驗。在《拒斥的身體：女性主義者對失能的哲學思考》（*The Rejected Body: Feminist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s on Disability*）中，溫朵（Susan Wendell）表示拭去或忽略失能者在日常生活中實際遭受的侷限和痛苦，既是殘忍，亦是扭曲；哈樂薇的〈賽博格宣言〉便是排除失能和病痛者所面對的艱辛現實，包括溫朵自己。[16]在〈理論中的失能：從社會建構主義到身體的新寫實主義〉（“Disability in Theory: From Social Constructionism to the New Realism of the Body”），史伯茲（Tobin Siebers）指出「失能者被迫與之共存的器械——義肢、輪椅、支架及其他裝置——經常不被視爲痛苦的來源，而被視爲人類形體之可塑性的驚奇範例或是賦予能力的設置」。哈樂薇在她著名的賽博格理論中，如是專注於能力和力量，以致於忘記何謂失能；對她而言，義肢假體總是增加賽博格的力量，它們只是新力量的來源，並非問題所在。賽博格永遠優於人類，也沒有被視爲次等人類的風險。「簡而言之，賽博格並未失能」。史伯茲自小腳部必須穿戴鐵製支架，瞭解箇中痛苦和辛苦，強調諸如哈樂薇的理論，對於苦痛的感受和經驗不切實際，建立一種著重能力的意識型態，而這樣的意識型態導致失能者被邊緣化，他們的苦痛和受害的故事，既無政治效益，且難以相信。[17]嘉蘭德—湯森（Rosemarie Garland-Thomson）在〈整合失能、改造女性主義理論〉（“Integrating Disability, Transforming Feminist Theory”）中同樣論辯，當前很多女性主義者召喚出混雜、詭異的人物，如怪

[15] 皮斯托利斯，南非的截肢短跑選手，以「刀鋒戰士」、「刀鋒跑者」封號而知名。他是世界身障奧林匹克運動會（Paralympic Games）的多項紀錄保持人。在由碳纖維製造的義肢的幫助之下，他的賽跑速度具有更強的競爭力，但也因此引發了公平與否的爭議。

[16] Susan Wendell, *The Rejected Body: Feminist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s on Disability* (London: Routledge, 1996), pp. 44, 169.

[17] Tobin Siebers, “Disability in Theory: From Social Constructionism to the New Realism of the Body,” *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 13.4 (Winter 2001): 745, 74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物、賽博格，將之理論化，藉此提出女性主義政治的僭越潛能。但是，這些隱喻式的召喚鮮少承認那些人物經常指涉的是失能者的眞實身體。抹滅眞實的失能身體削弱了她們的批判力道，並且失去了利用失能成爲女性主義的評論議題。[18]在《能者主義的輪廓：失能和健能的產生》（*Contours of Ableism: the Production of Disability and Abledness*）中，坎貝爾（Fiona Kumari Campbell）則提出質疑，哈樂薇對混雜形體及因其界線模糊、結合效益所產生的愉悅深感興趣，卻對失能身體和賽博格形塑的關聯性缺乏說明。她的沉默，導致難以認定失能身體做爲科技再造〈能者主義改造〉的受體和賽博格的形成兩者之間的差異。哈樂薇的問題，在於對義肢和使用者的相互關係，提出未經批判及過度樂觀的看法，忽略了文化中對義肢假體的想像。[19]

哈樂薇的賽博格理論令失能政治學者深感不安，因爲它或是因「治癒」而抹滅失能，或是利用失能身體作爲賽博格發展的跳板，之後讓它逐漸失去重要性，或是變成次要。除此之外，科技、科技進步不代表失能者的狀況或生活獲得改善。有些失能者，尤其是重度失能者，需要較複雜或昂貴的輔器、設施，但並非皆有經濟能力負擔。換句話說，並非所有失能者皆是賽博格，或皆能成爲賽博格。再者，倚賴科技的同時，雖然科技協助失能者在日常生活中能夠行使功能，獲得某種程度的自主、獨立，但是當機械出現問題時，例如輪椅或支架，隨時造成不便，又若是使用複雜的輔助器，如人工器官或置入性物件，可能導致生命發生危險狀況。

對失能研究學者而言，哈樂薇的賽博格理論中的失能／失能者明顯有諸多層面未被觸及和探討，因此早期未獲正面肯定。然而，最近幾年出現學者呼籲再次檢視、再度運用該理論，李薇（Donna Reeve）和卡佛（Alison Kafer）即是其中兩位。在〈賽博格、傷跛者與科技傷跛者：哈樂薇對失能研究之貢獻的省思〉（“Cyborgs, Crips and iCrips: Reflections on the Contribution of Haraway to Disability Studies”），李薇剖析哈樂薇的賽博格理論，瞭解重要的爭議在於科技修復身體的缺陷，再創正常身體，強化正常身體的思維，但她認爲這樣的想法忽

[18] Rosemarie Garland-Thomson, “Integrating Disability, Transforming Feminist Theory,” in *Gendering Disability*, ed. Bonnie G. Smith and Beth Hutchison (London: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79-80.

[19] Fiona Kumari Campbell, *Contours of Ableism: the Production of Disability and Ablednes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p. 60-6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略了賽博格理論的一個重要層面，即是促使思考「身障者和科技的關係如何顛覆日常生活中對**正常**的認知」。李薇希望與其視科技以正常爲目標來修復身障者而加以排斥，不如正視賽博格所產生的多樣、嶄新的存在方式，如此才具建設性。哈樂薇的賽博格論述開啓了建設性的方式來思考身體的主體性、身份、性別及物質性，這正是她對失能研究的貢獻。李薇以慕琳絲（Aimee Mullins）爲例，一九七五年出生時，因爲發生狀況，雙下肢必須截除。她於一九九六年參加在美國亞特蘭大市舉辦的身障奧運會，一九九九年開始充當模特兒，二〇〇二年開展演藝事業。她宣稱擁有多雙不同款式的義肢，經常換穿。李薇引述慕琳絲對義肢的看法：「義肢不再代表需要彌補的缺失，它可以象徵穿戴者具有能力，在該部位創造任何他們想創造的。所以，過去被社會認定爲失能的人，現在可以成爲自己身份的建築師，而且繼續在極具能力的境況，藉由設計自己的身體，不斷改變他們的身份」。李薇因此反對失能賽博格「注定」會被汙名化、會被視爲半個人類；她強調隨著科技進步且越來越普及，新的可能性於焉產生。李薇並且提出「科技傷跛者」（iCrip）來代表二十一世紀的失能賽博格：身障者將科技和自我的身體、心理全然整合，產生新的生活和生存方式，既是失能、也是非失能，既是不正常、也是正常。打破失能和非失能、不正常和正常的界線，科技傷跛者組織藉由產生新方式和新生命的能力，可以在文化、社會及政治上有所成就，爲未來帶來希望、改變。[20]

至於卡佛，在其《女性主義者、酷兒、傷跛者》（*Feminist, Queer, Crip*）中的專章，「賽博格和傷跛者」（"The Cyborg and the Crip"），細探哈樂薇的〈賽博格宣言〉。她指出哈樂薇是最早提及失能與失能者的女性主義者之一，即使對此論述十分有限；多年後，〈賽博格宣言〉依然是激發思想、內容豐富及深具創意的女性主義研究作品，而這作品能夠帶給失能研究無法預期的收穫。因此，卡佛主張不要因爲哈樂薇的能者修辭和論述而放棄〈賽博格宣言〉，而要繼續和賽博格這個形體奮戰，運用它來探索、質疑能者／失能者的二分法，重新想像賽博格，同時也要從過往對它的批判中學習。更重要的是，失能者不該只是被動的討論受體，應該主動「介入」，從失能研究角度來批判賽博格，將失能帶入

[20] Donna Reeve, "Cyborgs, Crips and iCrips: Reflections on the Contribution of Haraway to Disability Studies," in *Disability and Social Theory: New Developments and Directions*, ed. Dan Goodley, Bill Hughes and Lennard Davi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pp. 103, 10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賽博格，擴展賽博格的意涵，此即卡佛所定義的「致跛賽博格政治」（cripping cyborg politics）。卡佛認爲哈樂薇最明顯的問題在於對失能的瞭解十分狹隘，不僅如此，在視失能者——人類和機械的結合——爲賽博格的最佳典範之後，當她的論述進入政治認同、關係流變、建構未來時，失能和失能者完全消失、完全被拋諸在後——失能和失能者自政治領域被移除、遭受去政治化，暗示著失能者無法在政治層面扮演主動角色，和政治無所干係。「致跛賽博格政治」正是要讓人瞭解：「失能者之所以爲賽博格，並非因爲他們的身體（例如使用義肢、支架、呼吸器、或照護），而是因爲他們的政治性行動」。卡佛舉數例說明，包括賀須（Laura Hershey）。賀須因脊髓性肌肉萎縮症必須使用呼吸器和電動輪椅，她在一九七三至一九七四年獲選爲美國「肌肉萎縮症協會」（Muscular Dystrophy Association, MDA）的「海報小孩」（poster child），出現於該組織呼籲捐贈的海報及廣告上。「肌肉萎縮症協會」的目標在於克服神經肌肉疾病，每年徵選海報小孩及舉辦電視馬拉松式募款（telethon）。賀須和其他海報小孩的身體，皆被用來倡導治癒。多年後，賀須成爲反對電視馬拉松募款的運動領導人之一，結合之前的海報小孩、失能者權利運動者與非失能支持者，抗議、譴責該協會的治癒或克服的意識型態、同情憐憫的故事敘述、以及能者的專制心態和態度。賀須並未排斥或拒絕科技，而是運用科技來實踐她的信念，反對如「肌肉萎縮症協會」的慈善機構。賀須成爲賽博格，並非因爲她的缺陷或是倚賴科技，而是她致力於集結各方面的力量，共同改變社會對失能者的既有看法。諸如賀須的政治性行動，正是卡佛的「致跛賽博格政治」所要提倡和彰顯的。[21]

整合哈樂薇的賽博格理論與失能研究學者對賽博格的批判和增補，「失能賽博格政治」不僅重視失能賽博格身體如何打破人類和機械、正常和不正常、健能和失能的狹隘界線，並且正視失能身體和機械兩相結合的關係，即失能者的實際生活經驗。失能賽博格運用其身體和經驗顛覆能者社會和文化對失能賽博格或失能者的迷思、刻板印象和偏見歧視，改造失能者的形象，賦予動能、能力和力量，開創過去無法想像或希冀的願景和未來。本論文接續將以「失能賽博格政治」爲理論架構，析論《英雄和聖人》中薛麗的賽博格身體、失能經驗及政治行動。

[21] Alison Kafer, *Feminist, Queer, Crip*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118, 12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薛麗的賽博格身體、失能經驗及政治行動

在《英雄和聖人》中，薛麗僅有頭部，沒有身體，頭部之下是一個會滾動、桌子般的平台，稱爲座車，座車上有個按鈕，薛麗可用下巴操控。座車移動時所發出的微小聲音，預示她的出現，座車因此象徵她身體的一部份。薛麗的人類特質展現在其頭部，奧梅克文化（Olmecs）的巨型人頭石刻是極爲貼切的比喻（頁90）。艾帕蘿，莫拉佳根據前述抗議工會副主席者胡兒塔所塑造的角色，向記者安娜（Ana）形容薛麗的頭部像顆紅圓的櫻桃，所有的血液都集中在此，正是她聰明的原因。薛麗廣泛、勤奮閱讀，是個有智慧、敏銳且具幽默感的女孩。她對神父璜（Juan）說：「我的脖子以上是正常的」（頁107），化解他初見她時的不安或同情，也以「植物頭」（頁107）來自嘲。頭上的兩個部位是薛麗感覺、感官享受及情慾的所在：頭髮和舌頭。她的頭髮和舌頭皆被賦予不同的意義和功用，呈現她的與衆不同。薛麗的頭髮既長且滑順、厚實，「就像美麗的深色長簾」（頁107）。姊姊佑蘭達是位美髮師，五年來在她的頭髮上實驗所有市場的新產品，她的頭髮聞起來「像似熟透的熱帶果園」（頁107）。如同薛麗對神父璜所說的：「如果我的頭髮看起來不像樣，那我所剩無幾了」（頁107）。薛麗的秀髮展現的不僅是她柔美的女性特質，還有她的活力和生命力。

至於舌頭，對薛麗而言，是她「最忠實的器官」（頁108）。舌頭，以及牙齒和下巴，取代雙手的工作，如翻書頁、撿東西、抓癢、指示方向、操作座車、開關錄音機等。在一幕和神父璜獨處時，薛麗請他打開字典查閱「舌頭」，兩人一同唸出舌頭的諸多功能，包括語言的、感受的、情慾的，同時也說出薛麗的舌頭的多樣功能，尤其是情慾方面。失能身體並未讓薛麗失去情慾，她仍是具有情慾的主體。薛麗對於哥哥馬力歐（Mario）的「馬雅之神」故事，百聽不厭。「馬雅之神」指的是表親佛瑞迪（Freddie），在一次家庭聚會中，同性戀的馬力歐深深被俊美、健碩的他所吸引，爲他著迷。薛麗對這情慾故事的濃烈興趣，流露出她對親密肉體關係的渴望。薛麗的聰明、慧黠逐漸對神父璜產生吸引力，而她對親密肉體經驗的渴求甚至喚醒他壓抑已久的慾望。他告訴薛麗自己成爲神父的原因：「神父袍服，神父的身體沉睡在這套衣袍之下，它的沉重力量讓他平靜」（頁115）。在爲佑蘭達因病死去的女兒伊娃妮娜（Evalina）的守靈夜晚，薛麗向神父璜提及日前發生的新聞事件，即在薩爾瓦多的六位耶穌會神父，因爲公開譴責、抗議當權政府，六個人，以及他們的管家和她的女兒，慘遭殺害。薛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麗認爲管家和女兒極其無辜，並且幻想女孩可能和其中一位神父日久生情，愛上他。這時，她要神父璜觸摸她的頭髮，他於是溫柔地撫摸、嗅聞她的頭髮，並且愛撫她的臉頰。她將雙頰深深埋入他的雙掌，低聲呻吟，接著將臉舉向他的臉，他猶豫之後，親吻了她。薛麗呻吟，對他說「我要親嚐你，璜」（頁140）。他再次親吻她，薛麗的呻吟加深、加重。神父璜走向薛麗身後，將他的下體抵向座車後方，並將她的頭緊靠他的，手指絞繞她的頭髮，達到高潮。學者胡兒塔（Jorge Huerta）在分析墨裔美籍劇作家之作品的專書中，提及這一幕令她自己和同場看戲的觀眾感到十分驚訝，因爲從來沒有一部劇作如此展演一位神父的情慾；神父的情慾向來只被討論，未被演出。[22]同樣的，在失能戲劇／劇場中，如此以一位重度失能女孩的情慾爲焦點，大膽演繹她對情慾的渴望及親密時刻的反應，可能亦是首見。在醫學論述中，失能被認定是個人缺陷所導致功能上的欠缺或限制，需要醫學治療或科技修復，失能者因之被視爲「病人」，如孩童般依賴協助或照護。因爲醫學模式（medical model）強調缺陷、喪失和病態，失能者被認爲缺乏情慾或性慾發展可能。文化中亦充斥失能者不具情慾的刻版印象。如同史伯茲在〈失能者的性文化〉（“A Sexual Culture for Disabled People”）所指出的，「壓迫失能者的主要刻版印象之一，即是他們沒有情慾的感受和體驗或他們沒有或不想要性的迷思——簡而言之，他們沒有性文化」。[23]薛麗打破長久以來在醫學論述和文化想像中的誤解和迷思：失能者，尤其是重度失能者，不具情慾。沒有正常身體、沒有身體的薛麗，毫無保留地揭示了在失能者身上，情慾未曾匱乏，只是被壓抑、忽略或否定，改變觀眾對失能者之情慾的既定看法。[24]

由頭部和座車結合而成的薛麗，展現哈樂薇所讚頌的賽博格身體，以及賽博格所具有「分裂的身份」（fractured identity）。她強調「賽博格毅然地堅持各個部份」（頁151），不再是生物性的整體。分裂的身份看似部份且矛盾，但因爲無懼於和機械的緊密結合，得以從兩個不同立場來看待事物，看見了單一角度無

22 Jorge Huerta, *Chicano Drama: Performance, Society and Myth*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21.

23 Siebers, “A Sexual Culture for Disabled People,” in *Sex and Disability*, ed. Robert McRuer and Anna Mollow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39.

24 有關失能者之情慾議題的探討，請見施純宜（Chun-yi Shih）的〈「無器官身體即是慾望」：約翰・貝魯索之《美好時光》中的失能和情慾〉(“‘The BwO is desire’: Disability and Sexuality in John Belluso’s *Gretty Good Time*,” *Journal of Theater Studies* 22 (July 2018): 141-15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法想像的可能性。換而言之，賽博格看似單一個體，卻同時包含不同性質的部份，因此既是一個、也是多個的單一實體，開啓截然不同的主體性。有鑑於此，薛麗的賽博格身體展現特殊的主體性和身份：由肉體和機械結合而成的生命主體，兩者關係緊密，機械是身體的一部份，著重於彼此相互依賴，而非單一個體的完整、自主和獨立，因此身份是可塑、多樣、異質和流動。

如同李薇所堅持的，「致跛賽博格政治」抗拒輕易地稱頌科技的修復，而是切實探討身體與科技之間的複雜、矛盾關係（頁119）。借用貝契兒（Sharon Betcher）穿戴義肢的感想：「失能者對於身體和機械之間生硬的邊界及驚人的相異具有最敏銳的覺察」；不同於非失能者，他們可能想像科技賦予的身體應是神通廣大或堅不可摧，失能者其實在身體、心理上和科技賦予之身的僵硬和沉重不斷地搏鬥。[25]在《英雄和聖人》中，座車雖然讓薛麗能夠行動，擁有某種程度的自主和獨立，但它並非萬能，仍有其侷限性。莫拉佳在對薛麗一角的註記中強調：薛麗的人性特質不僅顯示於頭部，也在於她日常生活中的活動功能；「她的行動及限制是她個性的重要層面」（頁90）。座車隨時可因爲拍動輪上剎車或是拿走車上按鈕而無法行動，這時候，薛麗毫無控制能力，只能依賴他人來手推座車。行動上的限制不時影響薛麗的生活。此外，座車亦非眞實身軀，因爲沒有身軀和四肢，薛麗無法瞭解身體與皮膚相觸的感覺，致使她渴望擁有身體。薛麗告訴神父璜，有時候刻意不斷搖晃頭部，感受頭髮觸及面頰，她想像「這就是帶著面紗的阿拉伯婦女的感覺……柔軟的衣服暗地裡撫摸她們的身體」（頁107）；沒有身體的她，只能想像而已。在薛麗和神父璜親密一幕，他達到高潮後，立即離去，徒留她一人。之後他來見她，告訴她，身爲神父，那事不該發生，他的身體不屬於他個人。薛麗回答他：「我要的不是你的身體，而是我的。我所想要的，不過是希望你讓我感受到自己有個身體，因爲，事實上，我沒有，我的被剝奪了。但是，有好幾分鐘，在你開始思考前的幾分鐘，我感覺有整個身體，一直伸展到腳趾……我想念我自己」（頁144）。她接著責備他，如果自己像他有雙手雙腳，她會燒毀全鎮被毒害的葡萄園，給沒有孩子的婦女健康的嬰兒，還要看著他們長大，他浪費了他的身體。即使藉由座車得以行動，薛麗仍渴望擁有身

[25] Sharon Betcher, "Putting My Foot (Prosthesis, Crutches, Phantom) Down: Considering Technology as Transcendence in the Writings of Donna Haraway," *Women's Studies Quarterly* 29.3/4 (2001): 4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體，能夠體驗膚觸的感覺、眞切的肉體親密經驗、以及親身參與抗議活動。

薛麗失能的原因固然來自於先天的缺陷，但是最大的因素來自於後天的建構。一九七〇年代，英國失能研究學者、失能運動者提出「社會模式」（social model）來對抗、取代之前的「醫學模式」對失能的定義。有別於「醫學模式」視失能爲個人的缺陷或不正常所造成的不幸或悲劇，「社會模式」歸因於社會無法提供有助益或便利的環境、設施，身障者因此遭到排除、邊緣化，致使失能；除了環境和設施，社會和文化中對身障者的假設、誤解、偏見和歧視，成爲有害和壓迫的意識型態，亦是導致失能的原因。[26]簡而言之，失能的原因在於不利的外在環境、社會中能者的看法和態度、以及文化中對於身障者的呈現，即所謂的「社會建構主義」（social constructionism）。在《英雄和聖人》中，母親朵莉絲代表這股社會建構而致成失能的力量。在莫拉佳的作品中，父親的威權角色常由母親所取代，而如同德福傑（Julia De Foor Jay）在分析莫拉佳的三部劇作中母親角色所提出的，朵莉絲「傳承組織機構的意識型態，她的種族和性別身份由壓抑且無情的社會化過程所建塑，而這過程植基於傳統的天主教信念」；「總體而言，天主教教義是構成她的身份的首要信念系統」。[27]朵莉絲即是根據自身的宗教信仰和種族傳統來教養薛麗。她告訴佑蘭達，自己深切瞭解有個生病孩子的心情。朵莉絲訴說當薛麗出生時，完全不願意看她一眼，要求醫生用毯子蒙住她的頭，讓她窒息而死。但是薛麗一直大聲哭叫，醫生下不了手，告訴朵莉絲，這嬰兒一心想活。朵莉絲顯露的是身障者生不如死的慣有看法。莫瑞絲（Jenny Morris）在其代表作《反對偏見的驕傲：失能的個人政治》（*Pride Against Prejudice: A Personal Politics of Disability*）中，專章〈不值得活存的生命〉（“Lives not Worth Living”）探討安樂死的議題。莫瑞絲認爲安樂死主要來自於非失能者對於失能生命不值得活下去的假想。非失能者對於失能者的失能狀況，如癱瘓或依賴呼吸器，難以想像，認爲狀況悲慘，亦無生活品質，生命沒有價值和意義，如果是自己，寧願死掉。不值得的生命其實是非失能者的偏見，然

[26] Brian Watermeyer, *Towards a Contextual Psychology of Disablism* (London: Routledge, 2013), pp. 31-35.

[27] Julia De Foor Jay, “(Re)claiming the Race of the Mother: Cherríe Moraga’s *Shadow of a Man*, *Giving Up the Ghost*, and *Heroes and Saints*,” in *Women of Color: Mother-Daughter Relationships in 20th-Century Literature*, ed. Elizabeth Brown-Guillory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6), p. 10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而這樣的偏見普遍存在於社會之中。[28]對朵莉絲而言，薛麗的嚴重失能狀況正是一個不值得活下去的生命，早日解脫。活下來的薛麗，在父親眼中，是種羞恥，因此將她藏在家中。朵莉絲則認爲薛麗代表丈夫的罪惡，是上帝對他的懲罰，一如她告誡同性戀的兒子，愛滋病將會是上帝對他的懲罰。她曾公開嘲笑丈夫，無能的人生出缺陷的孩子，導致丈夫離開、拋棄家人。朵莉絲之後深懷愧疚，和丈夫一樣，不准薛麗出門，有訪客來家時，要她躲起來，甚至有時在家門外朝望，想知道外人能否看見倚窗的薛麗。

朵莉絲同時也代表墨西哥愛護、犧牲及受苦的傳統母親：對她而言，照料和關心孩子是母親一輩子的職責，不管孩子多大、離家多遠。她極力保護薛麗，不讓她在媒體曝光。如艾帕蘿所回憶的，薛麗兩歲時，所有報紙刊登她的照片，朵莉絲覺得人們像看戲般地觀賞，事不關己，從此拒絕讓媒體採訪薛麗。因此，她將薛麗禁足在家、不許出門，部分原因也是出於保護，免受外人的嘲弄和殘忍目光。朵莉絲一如許多母親堅毅地保護失能孩子，但同時也流露出失能者需要受到保護的心態，或是永遠像孩童般需要保護。而照片上的薛麗，反映出不正常身體常被正常／非失能者視爲「他者」，常成爲他們注視、觀賞、嘲弄或歧視的受體。朵莉絲對薛麗的保護同時也表現在她極力希望薛麗能夠保持無慾、聖潔。她原先認爲沒有身體的薛麗，沒有慾望——「像她這樣的女孩能犯什麼罪，神父？她天生如此」（頁100-101）。當朵莉絲發現薛麗閱讀馬力歐的人體構造書籍，害怕她受到世俗誘惑，立即請求神父璜來聽她的告解。朵莉絲告誡薛麗：「不要因爲妳沒有身體就不會犯罪，最嚴重的罪惡是在腦袋」（頁113）。她希望薛麗能保持純潔，衷心相信這是上帝造她如此的目的。換而言之，對於薛麗，朵莉絲「心中想像她是個純眞無邪的女孩，她的性靈純潔必須受到保護，和自家外的惡劣世界隔離」。[29]朵莉絲投映出社會、文化中對失能者不具情慾的想像，如前所言。如同朵莉絲認爲沒有身體的薛麗不具情慾或不該有情慾，她也認爲薛麗和外在社會、政治毫無關係。當艾帕蘿告訴朵莉絲記者安娜想採訪薛麗，她答稱薛麗什麼都不知道，佑蘭達立即反駁說薛麗都知道、都看見了。朵莉絲質疑薛麗整天看著窗外，能看到什麼？艾帕蘿因對記者表達看法而被工廠開除，之後，組成

[28] Jenny Morris, *Pride Against Prejudice: A Personal Politics of Disability* (London: Women's Press, 1991).

[29] Jon D. Rossini, *Contemporary Latina/o Theater: Wrighting Ethnicity*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18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母親和麥肯羅佛林鎮之友」，計劃上街頭抗議，幾次邀請朵莉絲加入。因爲多年前公開嘲弄丈夫，致使他離家，朵莉絲自責，便不再公開說話，同時也害怕加入抗議之列而失去工作，影響家計，堅持拒絕。朵莉絲不願加入抗議，也不准懷有強烈意願的薛麗參加組織。因此，當艾帕蘿在媒體之前公開演講，抗議學校堅稱該鎮水源未受汙染、拒絕接受廠商免費提供給學童的飲用水，其他抗議者走向台下觀眾席，發遞殺蟲劑毒害問題的傳單，此時薛麗只能在家中窗口看著一切。朵莉絲鬆開她的座車剎車，將她推離窗戶，不准她繼續觀看。她向母親抗議，自己除了靜靜觀看，還能做什麼？朵莉絲回答她：「妳不需要看」，「不需要做什麼」（頁112）。

在朵莉絲的教養和規範之下，薛麗不被看見、不被聽見、不該具有情慾、不得參與社區的政治活動，相較於她的先天缺陷，母親所代表的能者、錯誤或負面的觀念和信念，才是導致薛麗失能的首要因素，即建構薛麗失能的主要力量。被禁錮於家中的薛麗，如她對神父璜所形容的，就像籠中的金絲雀，這房子對她而言就像個籠子，有時候她希望夜晚窗外的濃霧能將它完全吞沒。薛麗只能就著窗口視野，看著外在世界。在一段獨白中，薛麗傾訴她所看到的景象：「羊群和我們一樣，喝著我窗外的飲水槽。今天的槽水是橘黃色。母親們的頭伸入生鏽已久的水桶喝水，腹中的孩子變成畸形。天眞無邪的他們，和我一樣，在含毒的水中沉睡、出生，無力的四肢捲縮在身體之下」；「我從窗口看著他們，並且哭泣」（頁99）。薛麗希望能夠脫離囚籠，像離家的馬力歐一樣，追求自由，也希望能夠身出家門，加入街頭抗議。她向朵莉絲懇求：「給我機會，媽媽。沒人看見我，我如何知道自己看起來怎樣？如何知道我會嚇到他們，或是激怒他們？或是……感動他們？如果外人能夠看見我，媽媽，事情將會改變」（頁113）。即使薛麗的賽博格身體可能令人感到恐懼或不悅，她仍然希望自己讓人看見，才有改變他們看法的機會。

相較於母親朵莉絲，鄰居艾帕蘿反而瞭解且支持薛麗。她希望朵莉絲能讓薛麗接受安娜的採訪，相信已長大成人的她，有很多話要說，也藉此讓世人知道葡萄園地主、政府對全鎮所做的事。艾帕蘿責罵朵莉絲，和她離去的丈夫一樣，把薛麗藏在家裡而無法感受到外面陽光曬在臉上的感覺，質問她還能讓薛麗和受苦的外在世界隔離多久？艾帕蘿相信薛麗看到鎮上所發生的事，甚至警告神父璜，別讓薛麗在爲伊娃妮娜守靈之夜外出，暗示她知道薛麗暗中進行的事情。艾帕蘿不僅瞭解薛麗，她組成團體、街頭演講和抗議，也成爲薛麗的榜樣，影響至深。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如同艾帕蘿所指出的，朵莉絲對薛麗的教養和禁錮有害無益，然而薛麗瞭解母親的呵護、辛苦和犧牲，默默忍受。她提及嬰兒時期第一次嚐到害怕的滋味：她在朵莉絲的汗水中嗅聞恐懼，而汗水流到雙乳，和乳汁混合，她的舌頭感受到濃烈苦味，不肯吸奶，甚至當朵莉絲強迫她時，嘴咬朵莉絲的雙乳。拒絕朵莉絲的的乳汁、餵養，或許可以詮釋爲薛麗拒絕母親的教養、觀念和束縛，抗拒將她建構、致成失能者的力量。借用莫舍（Ingunn Moser）在〈反抗正常化：顛覆健能和失能的規範〉（"Against Normalization: Subverting Norms of Ability and Disability"）中對哈樂維之賽博格理論的分析，因爲非人、嚇人的形體，「賽博格常處於邊緣和脆弱無助的境地，徵顯對於連結和社群的渴望」；非正常、邊緣化的賽博格希望向外伸展、邁進，和其他賽博格及群體建立關係。[30]和鎮民連結，正是困於家中的薛麗的衷心渴望。不願如母親所要求的安躲家中，薛麗自始至終全心全力追求的目標即是能夠離開家門，親身和鎮民團結，共同抵抗毒害家園的惡權勢力。事實上，第一幕第一景即已暗示薛麗和鎮上病童屍體被掛在十字架上、豎立於葡萄園中的一連串事件有關。短短一景，呈現清晨時分，一群帶著骷顱頭面具的小孩進入葡萄園，快速地將他們抬入的孩子般大小的十字架豎立起來，之後離去，十字架上隱約可見一個小孩身形。座車的機械聲音打破寂靜，薛麗出現，凝視著窗外的十字架，定住不動。黎明太陽突然昇起，陽光同時籠罩十字架上的小孩和薛麗。隨著劇情的發展，觀眾逐漸發現原來這一連串事件是薛麗透過艾帕蘿領養的女孩邦妮（Bonnie），向外聯絡、指揮孩子們的行動，目的是藉由暴露病孩的屍體，暴露當地嚴重的環境種族主義，引起媒體和世人關注。薛麗不願受害小孩無聲無息地埋入墳墓，遭受遺忘，因爲她堅信「任何人的死亡都不該遭受忽視」（頁139）。因爲讓世人見證鎮上所承受的不公不義，「這些掛於十字架上的孩子屍體，再現的並非某一個人的失去，而是全鎮的痛苦和犧牲」。[31]薛麗暗中指揮孩子們的行動顯示她已悖逆母親的信念和規範，已開始與外連結，開啓政治行動。

隨著多起病孩屍體掛立於葡萄園引起媒體報導，警方直升機在空中的監視愈加頻繁，以及警察打壓抗議者愈加凶暴，薛麗不願孩子們再冒危險，決定親自豎

30 Ingunn Moser, "Against Normalization: Subverting Norms of Ability and Disability," *Science as Culture* 9.2 (2000): 252.

31 Linda Margarita Greenberg, "Learning from the Dead: Wounds, Women, and Activism in Cherríe Moraga's *Heroes and Saint*," *MELUS* 34.1 (Spring 2009): 16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立伊娃妮娜的屍體，第十個死於癌症的嬰孩。在守靈之夜，朦朧睡眼中，薛麗看見朵莉絲向自己祈禱，於是有了獲得母親准許出門的方法。她讓邦妮和孩子們將她打扮成瓜達露佩聖母（La Virgen de Gualalupe），頭披聖母的藍星面紗，座車上放置一個小小的白色聖壇十字架，架上印有塔皮亞克山（Tepeyac Hill）的玫瑰花。朵莉絲看到薛麗，以爲是聖母顯靈，對她祈禱。鎮上教堂鐘聲響起，伊娃妮娜的葬禮即將開始。薛麗再次懇求母親讓她出去，看著她眼中的堅定決心，朵莉絲感到震懾，將薛麗／聖母推出戶外。朵莉絲請應神父璜告知而前來採訪的安娜看看她的女兒，也要讓世人都看見她。此時，鎮民聚集於教堂外，聆聽神父璜演說，當他們看見薛麗時，把他們死去或異常孩子的照片呈送給她，並在她的座車的白布上別上祈求神蹟的小飾物。薛麗隨即對著群眾說話：

> 把你們的手放入我的傷口內，在我傷口內的山谷中住有一群人，一群奇蹟的人，在他們居住的鎮上，河流中有紅色的血，但他們不害怕，因爲他們已經習慣這樣的紅色。和河流同樣顏色的血在他們身體中流動，就像太陽落下起伏山脈的顏色，也像他們出生時浸泡其中的液體的顏色。他們記得這一切，因此瞭解爲什麼他們的葡萄園，就像受傷者的破舊衣衫，飽吸這個顏色卻尚未結成果實。〔……〕你們是奇蹟之人，因爲今天，就在今天，憑藉勇氣，那在你們身體中的紅色記憶將湧出，泛流整座山谷，你們將獲得自由，自由地將這片土地命名爲母親。〔……〕母親……解放了。（頁148）

演講完畢，薛麗用嘴壓下座車按鈕，朝向葡萄園緩緩行駛，隨她而行的是神父璜，舉著掛有伊娃妮娜屍體的十字架。不久，鎮民突然聽見直升機上的機關槍聲響，大家驚嚇、尖叫，撲倒在地。突然之間，回到家鄉的馬力歐起身，舉起手臂，高喊「燒了葡萄園」（頁149），鎮民全部站起，同喊「燒了葡萄園」，衝向葡萄園。

在對群眾演講中，化身爲聖母的薛麗以耶穌基督釘於十字架上的傷口來比喻自身的缺陷，連結和她一樣遭受毒害、打壓的鎮民，並且把自己的傷痛身體引喻爲山谷大地，鎮民居住於其中，是她身體的一部分，最後激勵群眾，起而反抗，重獲家園鄉土，從壓迫中解脫，得到自由。薛麗的化身聖母，以傷痛爲訴求，連結、鼓勵鎮民，最後犧牲自己，終於激發全鎮集結成一股政治力量，反抗威權，追求公平正義。她的公開政治行動，讓她脫離受害者／失能者的邊緣境況，轉化爲激發反抗和開創改變的領導人。「這傷跛小孩成爲主要力量，藉由這股力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不僅她的家人，甚至整個社群能夠集結一起，付諸行動」。[32]如同那些屍體掛於十字架上的病孩，薛麗的犧牲同樣透過媒體公開報導、轉播，獲得見證，未受忽視、未被遺忘。賽博格薛麗打破諸多層面的二元界線，包括人類／機械、正常／不正常、健能／失能、自我／他者、男性／女性以及個人／群體。

從失能研究角度來看賽博格薛麗的故事，可能存有三個質疑。第一：這是否是一個賽博格英雄或「超級傷跛」的故事？在分析媒體中所看到的賽博格時，伯斯提克（Adam I. Bostic）指出，電影和電視中常見的賽博格形象可分爲兩類：英雄和群體。賽博格英雄聚焦於他／她如何透過科技獲得精進的整合、如何掙扎於全新身份、及最後接受且善用其賽博格身體。[33]侯爾（Alice Hall）在論述科技和失能時，批評媒體對於失能者如霍金博士（Stephen Hawking）、皮斯托利斯的報導，偏重科技效益，致使這些「超級人類」或「超級傷跛」的超凡能力掩蓋了人類的脆弱。[34]因此，所謂賽博格英雄或「超級傷跛」的故事，重點在於人類如何和科技整合而展現驚人能力，或是失能者運用科技而戰勝失能，徵顯科技的優越力量。在《英雄和聖人》中，座車如同薛麗的身體和雙腳，藉此得以行動，除此之外，並無特殊功能。換而言之，座車並未完全彌補或是掩蓋薛麗的失能，或是賦予異於常人的能力。故事的焦點也並非是薛麗如何整合機械身體、接受賽博格身份、凸顯其賽博格身體的不凡，而在於她承受座車的侷限，更重要的是，在於她抗拒、克服建構失能的力量；薛麗最後領導群眾的成就，並非拜座車之賜，而是來自於自身的毅力和智慧。《英雄和聖人》並未流於通俗的賽博格英雄或「超級傷跛」的故事。

第二個質疑：薛麗是否以聖母身份，而非失能者，激勵鎮民，促成反抗行動？當神父璜第一次探望薛麗時，她立即直接告訴他，她對上帝毫無用處，並非她不相信上帝存在，而是她不在乎（頁101）。薛麗不接受母親所堅信的，即上帝對她有其旨意，也不相信宗教。因此，化身聖母，純然是一時「計謀」，藉此獲得母親允許，出門加入群眾行動。[35]如同慕琳絲所說的，失能者能夠運用不同

[32] Elizabeth C. Ramírez, *Chicanas/Latinas in American Theatre: A History of Performanc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23.

[33] Adam I. Bostic, "Automata: Seeing Cyborg Through the Eyes of Popular Culture, Computer-Generated Imagery, and Contemporary Theory," *Leonardo* 31.5 (1998): 360.

[34] Alice Hall, *Literature and Disability* (London: Routledge, 2016), pp. 10-11.

[35] Joanna L. Mitchell, "Haunting the Chicana: The Queer Child and the Abject Mother in the Writ-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設計來不斷改造身份，薛麗的聖母裝扮爲自己的賽博格身體再造身份。這策略改變了朵莉絲向來視薛麗爲羞恥的心態，不僅推她出門，並且主動將她展現於媒體與世人之前。然而，聖母裝扮無法遮掩薛麗的失能。在對群眾演講中，薛麗以失能／傷痛身體來連結、激發同受迫害的鎮民；在劇末，她的最後動作是以嘴壓下座車按鈕，朝向葡萄園緩緩行駛。薛麗化身聖母，但仍是失能的聖母。如果對鎮民而言，薛麗是聖母再現，是他們的宗教或精神領袖，但對觀眾而言，或許依舊是失能的薛麗。借用蜜妮契的觀戲經驗，在舞台呈演時，薛麗的座車常以輪椅替代，「促使薛麗的抗爭行動和失能者權利運動有明顯的連結」（頁263）。喬裝聖母的薛麗，在鎮民和觀眾眼中，依然是失能者。

第三個質疑是：薛麗的死亡是否終究讓她落入受害者的刻板形象？路薏絲（Victoria Ann Lewis）在當代美國失能劇作家之作品合集的介紹章節中指出，受到「醫學模式」概念的影響，失能被視爲個人不幸，失能者抑或得到治癒、抑或透過收容於病院或死亡而自社會中聲消跡匿；「醫學模式」爲劇場添加兩種角色或劇情：英雄般克服者和英雄式自殺者。[36]死亡或自殺常是失能角色的最終境況，造成失能之受害者的傳統或刻板印象。在《英雄和聖人》的劇末，薛麗從身出家門、激勵鎮民，到率先駛向葡萄園，短短一幕，她最後獲得自由和自主曇花一現，她的犧牲的確極易視爲受害者。然而，薛麗的死亡並非突然；她對神父璜和朵莉絲皆說過「烈士不苟活」（頁112；125），表明加入群眾抗議行動和抱死的堅定決心。薛麗之死早已預示，而且意義也異於傳統。傳統的失能角色的死亡，象徵無法見容或適存於能者社會，自正常社會消失。至於薛麗的死亡，一如她主導暴露病童屍體於葡萄園中，目的在於引起媒體和社會關注，尋求正義；薛麗雖死，但其失能與失能原因並未隨之消失，而是社會和世人有目共睹。薛麗短暫生命的可貴之處，也許在於她爲達成自己所做之決定的轉變過程——從禁錮家中，承受身體缺陷和建構失能的力量，到集結、領導鎮民，她將個人失能和鎮民的集體傷痛成爲政治事件、集體抗議成爲政治活動。薛麗的蛻變打破失能被害者的負面形象，展現失能賽博格的潛力、毅力和能力，體現卡佛的「致跛賽博格政

ing of *Cherríe Moraga*," in *Unveiling the Body in Hispanic Women's Literature: From Nineteenth-Century Spain to Twenty-First-Century United State*s, ed. Renée Sum Scott and Arleen Chiclana Y González (New York: Edwin Mellen Press, 2006), p. 216.

36 Victoria Ann Lewis, "Introduction," in *Beyond Victims and Villains: Contemporary Plays by Disabled Playwrights* (New York: Theatre Communications Group, 2006), p. xxii.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治」精神，呈現失能者的正向能量和正面形象。

結語：後人類失能演繹

在「魔幻寫實主義」（“Magical Realism”）中，艾爾達馬（Frederick Luis Aldama）指出拉丁美洲作家深受兩種故事敘述模式所吸引：寫實主義和魔幻寫實主義。就魔幻寫實主義而言，它是一種同時遵守卻也打破自然法則的創作風格；世俗平凡的現實、經驗和極不可能的事件、行爲、角色全然融合，呈現全新觀點，對讀者產生奇特影響。[37]在《英雄和聖人》中，莫拉佳運用的戲劇手法即是魔幻寫實主義——寫實的環境毒害事件中融入一位「極不可能」的角色，即由人類頭部和機械座車結合而成的薛麗。賽博格薛麗打破自然法則所定義的人類，探索後人類形體、主體和情慾的可能性，呈現後人類的一種想像。如同納亞（Pramod K. Nayar）在《後人類主義》（*Posthumanism*）中所闡釋的，批判性的後人類主義極力顛覆「傳統的至尊、一致與獨立自主的人類」，揭示人類早已不斷和機械結合、產生多樣的生命型態；後人類主義拒斥傳統人本主義中的能者主義，進而納含多樣身體，包括能力不同的身體。[38]賽博格薛麗，解構「至尊、一致與獨立自主的人類」、展現失能者能力，成爲後人類多樣身體中的一種。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多位失能研究學者對於失能與後人類研究的提醒。古德利（Dan Goodley）、羅森（Rebecca Lawthom）與倫絲威克（Katherine Runswick）在合著的〈後人類失能研究〉（“Posthuman Disability Studies”）中，運用布蕾朵蒂（Rosi Braidotti）的後人類論述，[39]提出三項要點：「超越自我的生命：再探增能」、「超越物種的生命：再探動物」、「超越死亡的生命：再探死亡」。在「超越自我的生命：再探增能」中，三位作者認爲提及增能，立即聯想的是科幻世界和賽博格，但不可忽略的是潛藏其中對於能者主義和拭去失能的憂慮；失能者有權利選擇不被科技修復，維持不正常的失能。對於選擇使用科

37 Frederick Luis Aldama, “Magical Realism,” in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Latino/a Literature*, ed. Suzanne Bost and Frances R. Aparicio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pp. 334-335.

38 Pramod K. Nayar, *Posthumani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4), pp. 2, 4.

39 布蕾朵蒂兩度簡短地肯定失能研究對於正常/能者身體的批判，有助於後人類主義的思考和探討，請見Rosi Braidotti, *The Posthuma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3), p. 146；*Posthuman Knowled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9), pp. 138-13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技、機械或輔具的失能者，他們都是賽博格，但更重要的，他們的「失能永遠須被視爲具有潛能，而非欠缺匱乏，徵顯一種增強的人性，一種遠遠超越賽博格形象之侷限的後人類性」。[40]艾倫（Kathryn Allan）在探討義肢與後人類時則指出：從失能角度來看，人類邁向後人類的過程並非是明確清楚、必然發生的進展。未經批判的後人類主義所推崇的超越，忽略了目前人類生活中諸多不平等和苦難，這樣的超越或是犧牲或是漠視失能身體。放縱恣意的後人類主義輕率地將使用科技的失能者高舉爲後人類的典範，隱藏滅除不同身體的危險。失能研究在多方面爲能者對超凡身體的幻想提供基礎，得以落實。[41]莫瑞（Stuart Murray）在《失能與後人類：身體、科技與文化的未來》（*Disability and the Posthuman: Bodies,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Futures*）中亦表達相同關切，他認爲不應該將使用科技的失能者簡化爲賽博格，而是應該探究失能者和科技互動的生活經驗如何爲後人類論述中有關哲學思考與生命政治範疇提供平凡、日常的範例。[42]前述學者皆強調在視失能賽博格爲後人類的體現時，不僅相信他們具有發展、增強的可能，同時在乎他們在生活中運用科技／機械的實際經驗，以及承受的苦痛和掙扎。有鑑於此，後人類失能的重要精神在於廣納且尊重多樣的失能身體；對於失能賽博格，肯定他們藉由科技／機械的協助所展現的潛力、能力與所展開的前景、可能，同時之間，也要重視他們的失能切身經驗，包括肉體、情緒和心理各個層面，並且正視他們在社區、社會和政治上的存在、價值和意義。

《英雄和聖人》寫實地呈演一位失能賽博格的故事，展現在觀眾眼前的，不是眩目、高端的科技或科技造就的超人能力，而是薛麗與共存的平凡機械座車在日常生活中的失能經驗；然而，在薛麗身上，觀眾眞切看見、深切瞭解一位失能賽博格的各個面向。賽博格薛麗在其失能經驗中所綻現的智慧、堅毅、能力和轉變，以及以其失能身體和苦痛經驗連結社群、開創生命共同體，成功演繹後人類失能的一種可能。[43]

---

40 Dan Goodley, Rebecca Lawthom, and Katherine Runswick, “Posthuman Disability Studies,” *Subjectivity* 7.4 (2014): 351, 352.

41 Kathryn Allan, “Reading Disability in Science Fiction,” in *Disability in Science Fiction: Representations of Technology as Cure*, ed. Kathryn Alla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p. 11.

42 Stuart Murray, *Disability and the Posthuman: Bodies,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Futures* (Liverpool: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2020), p. 23.

43 願將此文獻給國立中山大學外文系孫小玉教授——生命中的良師、典範。論文刊出之際，恰逢老師榮譽退休，衷心對老師爲臺灣學術界之失能研究所做的貢獻，致上滿滿敬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莫拉佳之《英雄和聖人》中的失能賽博格

施純宜

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副教授

本論文探討莫拉佳（Cherríe Moraga, 1952-）之《英雄和聖人》（*Heroes and Saints*, 1992）中失能薛麗的賽博格身體與相關議題。全文主要有兩部份：第一部份爲「失能賽博格政治」，整合哈樂薇（Donna Haraway）的賽博格理論與失能研究學者的批判和增補，闡釋「失能賽博格政治」不僅重視失能賽博身體如何打破人類和機械、正常和不正常、健能和失能的狹隘界線，並且正視失能身體和機械結合的實際生活經驗。第二部份爲薛麗的賽博格身體、失能經驗及政治行動。因母親於懷孕期間在遭受化學藥劑汙染的葡萄園工作，薛麗出生時只有頭部，頭部安置在座車上，得以行動。相較於先天缺陷，薛麗失能的主要因素來自於後天的建構，母親代表這股社會建構而致成失能的力量。在她的教養和規範之下，薛麗不被看見、不被聽見、不該具有情慾、不得參與社區的政治活動。薛麗打扮成聖母，終於獲得篤信天主教的母親准許出門。薛麗對聚集的鎮民演說，訴說共同的傷痛和苦難，之後朝向葡萄園駛去，引來警方開槍掃射。受到薛麗的激勵，憤怒的鎮民衝向葡萄園，起而抗爭。結論部份指出後人類失能的重要精神在於納含不同失能身體，同時也肯定失能者藉由科技／機械的協助所展現的能力與所展開的前景，並且重視他們的失能切身經驗，以及在社會和政治上的存在和價值。賽博格薛麗演繹失能賽博格的失能經驗、堅毅和轉變，並以其失能身體和苦痛經驗連結社群、激發集體政治力量，展演後人類失能的可能。

關鍵字：莫拉佳　《英雄和聖人》　失能　賽博格　後人類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The Disabled Cyborg in Cherríe Moraga's *Heroes and Saints*

Chun-yi SHIH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presentation of cyborg Cere in *Heroes and Saints* (1992) by the Chicana playwright Cherríe Moraga (1952-). The first part of the paper expounds Donna Haraway's 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cyborg in "A Cyborg Manifesto" (1991) integrated with the critiques on her essay by Disability Studies scholars. The second section discusses Cere's cyborgian body, lived experience, and political action. Cere, the 18-year-old Chicana who was born with a head but no body after her pregnant mother, Dolores, had worked in the chemically contaminated vineyards. Her head is positioned on her "raite," a rolling, table-like platform which is automated by a button she operates with her chin. Seeing Cere's disability as shame, Dolores does not allow her to leave the house. Cere is determined to have the corpse of her baby niece crucified in the vineyards to make the environmental violence done to her community visible. She thus transforms into La Virgen de Guadalupe to convince her Catholic mother to let her out. She then speaks to the public outside the church, urging them to revolt against the violence rather than accept it passively. Soon after her ritualized speech, Cere proceeds into the vineyards, and is shot down by the helicopter of the police. Her death spurs her people to rush to the vineyards and burn the fields. Finally,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cyborg Cere—destabilizing the boundaries between human-machine, normal/abnormal, and able-disabled and liberated from the traditional limits of the body—acts out posthuman possibility with respect to bodily diversity. Her cyborg body and lived experience become an embodiment of posthuman disability.

Keywords: Cherríe Moraga *Heroes and Saints* disability cyborg posthuman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徵引書目

Aldama, Frederick Luis. “Magical Realism.”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Latino/a Literature*. Ed. Suzanne Bost and Frances R. Aparicio.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Allan, Kathryn. “Reading Disability in Science Fiction.” *Disability in Science Fiction: Representations of Technology as Cure*. Ed. Kathryn Alla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Balsamo, Ann. *Technologies of the Gendered Body: Reading Cyborg Women*.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6.

Betcher, Sharon. “Putting My Foot (Prosthesis, Crutches, Phantom) Down: Considering Technology as Transcendence in the Writings of Donna Haraway.” *Women's Studies Quarterly* 29.3/4 (2001): 35-53.

Bostic, Adam I. “Automata: Seeing Cyborg Through the Eyes of Popular Culture, Computer-Generated Imagery, and Contemporary Theory.” *Leonardo* 31.5 (1998): 357-361.

Braidotti, Rosi. *The Posthuma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3.

———. *Posthuman Knowled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9.

Campbell, Fiona Kumari. *Contours of Ableism: the Production of Disability and Ablednes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Davidson, Michael. *Concerto for the Left Hand: Disability and the Defamiliar Body*. Ann Arbor: Michigan University Press, 2011.

Davies, Telory W. “Race, Gender, and Disability: Cherríe Moraga’s Bodiless Head.” *Journal of Dramatic Theory and Criticism* 21.1 (Fall 2006): 29-44.

De Foor Jay, Julia. “(Re)claiming the Race of the Mother: Cherríe Moraga’s *Shadow of a Man*, *Giving Up the Ghost*, and *Heroes and Saints*.” *Women of Color: Mother-Daughter Relationships in 20th-Century Literature*. Ed. Elizabeth Brown-Guillory.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6.

Garland-Thomson, Rosemarie. “Integrating Disability, Transforming Feminist Theory.” *Gendering Disability*. Ed. Bonnie G. Smith and Beth Hutchison. London: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4.

González, Jennifer. “Envisioning Cyborg Bodies: Notes form Current Research.” *The Cyborg Handbook*. Ed. Chris Hables Gray, Steven Mentor, and Heidi J. Figueroa-Sarriera.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Goodley, Dan. *Disability Studies: An Interdisciplinary Introduction*. Los Angeles: SAGE, 2010.

Goodley, Dan, Rebecca Lawthom, and Katherine Runswick. “Posthuman Disability Studies.” *Subjectivity* 7.4 (2014): 342-361.

Gray, Chris Hables. *Cyborg Citizens: Politics in the Posthuman Age*.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Greenberg, Linda Margarita. “Learning from the Dead: Wounds, Women, and Activism in Cherríe Moraga’s *Heroes and Saints*.” *MELUS* 34.1 (Spring 2009):163-184.

Hall, Alice. *Literature and Disability*. London: Routledge, 201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Haraway, Donna. "The Actors Are Cyborg, Nature Is Coyote, and the Geography Is Elsewhere: Postscript to 'Cyborgs at Large'." *Technoculture*. Ed. Constance Penley and Andrew Ros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1.

———."A Cyborg Manifesto: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Feminism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 "Cyborgs to Companion Species: Reconfiguring Kinship in Technoscience." *The Haraway Reader*. Ed. Donna Haraway.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 "Cyborgs, Coyotes, and Dogs: A Kinship of Feminist Figurations." *The Haraway Reader*. Ed. Donna Haraway.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 "Cyborgs at Large: Interview with Donna Haraway." *Technoculture*. Ed. Constance Penley and Andrew Ros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1.

———. "Cyborgs and Symbionts: Living Together in the New World Order." *The Cyborg Handbook*. Ed. Chris Hables Gray, Steven Mentor, and Heidi J. Figueroa-Sarriera.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Hayles. N. Katherine. "The Life Cycle of Cyborgs: Writing the Posthuman." *The Cyborg Handbook*. Ed. Chris Hables Gray, Steven Mentor, and Heidi J. Figueroa-Sarriera.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Huerta, Jorge. *Chicano Drama: Performance, Society and Myth*.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Kafer, Alison. *Feminist, Queer, Crip*.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3.

Lewis, Victoria Ann. "Introduction." *Beyond Victims and Villains: Contemporary Plays by Disabled Playwrights.* New York: Theatre Communications Group, 2006.

Minich, Julie Avril. "You Gotta Make Aztlán Any Way You Can: Disability in Cherríe Moraga's *Heroes and Saints*." *Disability and Mothering: Liminal Spaces of Embodied Knowledge*. Ed. Cynthia Lewiecki-Wilson and Jen Cellio.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11.

Mitchell, Joanna L. "Haunting the Chicana: The Queer Child and the Abject Mother in the Writing of *Cherríe Moraga*." *Unveiling the Body in Hispanic Women's Literature: From Nineteenth-Century Spain to Twenty-First-Century United State*s. Ed. Renée Sum Scott and Arleen Chiclana Y González. New York: Edwin Mellen Press, 2006.

Moraga, Cherríe. *Heroes and Saints & Other Plays*. Albuquerque: West End Press, 1994.

Morris, Jenny. *Pride Against Prejudice: A Personal Politics of Disability*. London: Women's Press, 1991.

Moser, Ingunn. "Against Normalization: Subverting Norms of Ability and Disability." *Science as Culture* 9.2 (2000): 201-240.

Murray, Stuart. *Disability and the Posthuman: Bodies,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Futures*. Liverpool: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2020.

Nayar, Pramod K. *Posthumani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4.

Parker-Starbuck, Jennifer. *Cyborg Theatre: Corporeal/Technological Intersections in Multimedi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Performance.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Prins, Baukje. “The Ethics of Hybrid Subjects: Feminist Constructivism According to Donna Haraway.” S*cience, Technology, & Human Values* 20.3 (Summer 1995): 352-367.

Ramírez, Elizabeth C. *Chicanas/Latinas in American Theatre: A History of Performanc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0.

Reeve, Donna. “Cyborgs, Crips and iCrips: Reflections on the Contribution of Haraway to Disability Studies.” *Disability and Social Theory: New Developments and Directions*. Ed. Dan Goodley, Bill Hughes and Lennard Davi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Rossini, Jon D. *Contemporary Latina/o Theater: Wrighting Ethnicity*.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2008.

Sandoval, Chela. “New Science: Cyborg Feminism and the Methodology of the Oppressed.” *Cybersexualities: A Reader on Feminist Theory, Cyborgs, and Cyberspace*. Ed. Jenny Wolmark.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9.

Shih, Chun-Yi. “‘The BwO is desire’: Disability and Sexuality in John Belluso’s *Gretty Good Time*.” *Journal of Theater Studies* 22 (July 2018): 141-158.

Siebers, Tobin. “Disability in Theory: From Social Constructionism to the New Realism of the Body.” *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 13.4 (Winter 2001): 737-754.

———. “A Sexual Culture for Disabled People.” *Sex and Disability*. Ed. Robert McRuer and Anna Mollow.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2.

Tolan, Kathleen. “We Are Not a Metaphor.” *American Theatre* (April 2001): 17-21, 57-59.

Watermeyer, Brian. *Towards a Contextual Psychology of Disablism*. London: Routledge, 2013.

Wendell, Susan. *The Rejected Body: Feminist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s on Disability*. London: Routledge, 1996.

Yarbro-Bejarano, Yvonne. *The Wounded Heart: Writing on Cherríe Moraga*.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0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